

# 1980年代儿童小说中的

# “新加坡儿童”

叶若诗为李光前参考图书馆之参考咨询馆员，专责中文艺术类馆藏。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系专攻中国现代文学，考获硕士学位。身为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的她，自小喜爱中华文学。

Jessie Yak is a Reference Librarian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She manages and develops content for the library's Chinese Arts collection. She stud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Beiji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literary scene in post-war Singapore was flooded with newcomers in the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scene. Among all the genre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encouraged writers to create works for children using Singapore as the backdrop. By the early 1980s, children's literature was a hot topic, discussed and debated at length in numerous articles in various Chinese newspapers. Given the attention it received, Jessie Yak conducted a study o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1980s that adopted Singapore as the setting,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how local children were portrayed in th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中文创作风气盛，文艺新秀不断涌现并积极发表作品，使文坛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图景。其中，在政府领导人的呼吁、官方部门的推动下，<sup>2</sup>儿童文学在1970年代末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到了1980年代初更是被广泛讨论，报章上经常刊登有关儿童文学的议论文章。<sup>3</sup>1980年代伊始的第一天，《星洲日报》便刊登了“80年代的新加坡文艺”座谈会的记录，<sup>4</sup>作家周国灿（周燊）在会上提出，80年代应该是多注意儿童文学的创作的时候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应该可以成为80年代文艺其中的一个特点。

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1980年代在新加坡出版，以本地生活为背景的儿童小说作为关注对象，尝试探讨在建国约二十年后，儿童小说里所呈现的“新加坡儿童”面貌。耐人寻味的是，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文出版界的蓬勃，这类作品的数量竟然不多。1979年7月，《星洲日报》便刊登过一篇名为“谈我国儿童文学”的评论，里头提到

“我国的儿童文学虽然已经得到关注，但是还仅于开始阶段，距离全面发展与丰硕的成绩仍有段差距”，而且“就目前市面上书局所销售的各种儿童书刊来看，现今我国儿童阅读的作品，有很多是过去各国的作家的创作而遗留下来的，或者是来自香港、欧美各国等地的儿童书刊，……真正属于本国作家所创作的儿童文学，却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sup>5</sup>与这篇文章相呼应的是，1982年胜利书局出版“小顽皮”小说系列时，广告中还打出了“第一套取材于本地的少年儿童读物”的宣传文字。<sup>6</sup>

尽管选择不多，笔者在阅览了大部分收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这类儿童文学读物后，还是觅得一些符合探讨范围的作品，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梳理。不论在哪个年代，儿童的生活范围总离不开家庭、学习、朋友，和玩乐，因此笔者也围绕这几个方面归纳出以下的特点。

## 生活环境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加坡，经济急速发展，在1981年就已与南韩、香港、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sup>7</sup>这样的经济转变无可避免地影响了孩子们的生活，而细心敏感的作家们也把这些影响和改变一一捕捉到作品中。

### 一 组屋生活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就致力于建造组屋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以组屋为主的公共住房。<sup>8</sup>因此，与建国前的文学作品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大部分的故事主人翁都住在组屋里，或作品中对组屋生活有大量描写。



孩子们在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阅儿童图书，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MITA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在《我的世界快乐多》里，主人翁丽莲便住在组屋，她每天放学回家必做的事情便是到组屋底层的信箱集中处去查看有没有当海员的父亲寄回来的家书，然后带着弟弟海山搭电梯回家。作者巧妙地将信箱和电梯的特征与丽莲的动作与心情形成对比，突出了丽莲内心的忐忑不安与沉重焦灼：

丽莲的家居于高高的十二楼，所以分配给他们的信箱也在较高的地方。……她踮起脚跟，伸出食指……信箱里，黑洞洞的不见半抹信封的影子，丽莲万般失望，怏怏然的缩手，手指一移开，信箱的缝盖登时自动关上……丽莲沮丧的跨进电梯，门关闭了，电梯缓缓的上升，而她的心竟匆遽下降，下降——<sup>9</sup>

在《小顽皮学乖了》里，主人翁可欣与一班同学到一房式组屋区探访受伤的同学秀花，在家访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

- i. 有家长叫尿急的孩子在电梯里撒尿；
- ii. 组屋环境阴暗，为了减少开销，邻居的孩子待晚上走廊灯亮后，到走廊尽头温习功课；
- iii. 秀花家里的唯一“房间”是用布围出来的，夜里她的父母睡在“房间”里，两个弟弟睡在双层床的上层，奶奶和妹妹睡下层，她自己有时和奶奶、妹妹挤下层床，有时睡地板。

秀花挤迫拮据的家境给可欣一行人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课，使他们更珍惜自己较为舒适的环境，也下定决心要更努力学习，因为他们都比秀花幸福得多。<sup>10</sup>

## 二 贫富之间

当国家经济正在转型时，像丽莲、秀花那样的低收入家庭固然依旧存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买得起奢侈品，并且能够出国旅游的富裕阶层。而这些富裕家庭的消费行为，都给自家的孩子，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冲击。

在《小顽皮学乖了》里，年终考试结束后，学生都把家里的玩具带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玩。一群小学生之间的对话便反映了部分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心态：

“噢，雅萍，怎么你又买了一个新的电子游戏机？” 洁晶问道。

“嗯，昨晚妈妈带我去‘shopping’我吵着她买给我的。” 班上的富家女雅萍道。

“你不是说上个月你爸爸刚买了一个一百七十多块的太空电子玩具吗？怎么现在又吵着妈妈买电子游戏机呢？” 小慧不解地问。

“哎呀！那个我已经玩腻了。”

“玩腻了？” 伟强奇怪地问道：

“那么如果这个玩腻了，你也要买多一个？”

“当然啦” 雅萍毫不在乎地道：“现在我家已经有四个电子游戏机了。”

“咩，四个！”

众人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在《跳字手表》里，来自单亲家庭的优异生明光兴冲冲地赶到巴刹，准备告诉当菜贩的母亲，自己不但考到全班第一名，而且是全级第一名；他要母亲履行诺言，送他一只期盼已久的电子跳字手表。可是当他们喜孜孜地回到家中，母亲拿出表来时，却是一只泛着黄光的旧表，明光失望得掉头就走。

第二天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明光看到同学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换了新表，连最后一名的李名发也换了，他那个电子表不是刚买的吗？这些人真是浪费。李名发还说过几天他妈妈要带他到美国玩呢，耀成也说要去马来西亚。只有他，连个手表都没有，更不用说到哪里去玩了。他闷闷不乐地坐在礼堂里……<sup>12</sup>



胜利书局“蜗牛少年儿童读物”之一的《小顽皮学乖了》（“小顽皮”小说系列）。

与此同时，明光的母亲为了赚钱给他买电子表，学非法菜贩冒险把菜拿到路边卖，结果被警察抓了。明光跑回家想把那个旧表拿去典当，筹钱把母亲保释出来。看着那个旧表，明光为自己的虚荣心害苦了母亲而悔恨不已。幸好因母亲是初犯，警方只罚了她二十元，警告一番后，便把她释放了。

## 学习任务

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的二十天后，副总理杜进才在一个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时便提到，如今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家，本地的大专学府也需要随着重新定位其目标，确保其毕业生不但充分掌握专业领域内的学识，同时也具备受到海内外认可的素质与能力。<sup>13</sup>三个多月后，报章报道了政府正在加紧通过不同管道，例如理工学院和职业专科学院，为多种工业培训员工，以便各工业内备有一批随时能上阵的熟练员工。<sup>14</sup>政府对教育素质和技能培训的重视，再加上国家发展过程中各业界如电子业、<sup>15</sup>交通业<sup>16</sup>等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殷切需求，<sup>17</sup>遂造成

父母普遍对子女教育的要求偏高。除了课后补习外，各类课余活动如学习乐器、舞蹈、绘画、游泳等也是不少学生的日常生活内容。

于是，在文学作品中便经常看到因达不到父母的课业要求而承受巨大压力、或因忙于应付多个补习和活动而身心俱疲的儿童身影，例如在《可怜的小龙》<sup>18</sup>里的同名主人翁、“小顽皮”系列<sup>19</sup>里的爱玲、《漫游新加坡》<sup>20</sup>里的小英、《妈妈，你还爱我吗？》<sup>21</sup>里的小坤、《我要100分》<sup>22</sup>里的尊尼、《玲玲的星期天》<sup>23</sup>里的同名主人翁等。

当然，作品中也有像“小顽皮”系列里的邦邦和燕萍那样能够自发温习功课，不用家教监督的优异生；或像《不能公开的礼物》里的自光，<sup>24</sup>和《我的世界快乐多》里的丽莲那样因家境不佳而未请家教的学生，不过相对而言，他们还是属于较少被刻画的一群。有意思的是，作品中要求严格的父母一般都来自富裕家庭，而《不能公开的礼物》里却描绘了一个需要在家中车衣补贴家用，但依然紧张孩子学习成绩的母亲：

（自光）才放下电话，妈妈就从房里冲了出来，她的耳朵怎么那么灵？

“你没有抄什么？有功课还不快点去做！慢吞吞的，别忘了，你今年要参加分流考试呀！看你弟弟妹妹，人家一个二年级，一个一年级，都比你听话，做功课从来不用我叫，谁象你，他们两个都念下午班，没人打扰你，你还不能安心地去做你的功课，真没你的办法，如果不及格啊，你可别来见我！”……

“砰”的一声，自光把房门关上，妈妈却怔在门外。

这孩子，这么大了，一点也不谅解大人的苦心，越来越虚荣，越来越贪图享受，他什么时候才会明白事理？<sup>25</sup>

## 情感表现

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尚未高度城市化与商业化，人们的思想感情中还带有不少源自“甘榜”生活的淳朴敦厚，而这样的思维也连带影响了孩子，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儿童，其情感表现有时纯真得让人莞尔，有时又诚挚得令人动容。

在《小顽皮哭了》的第四章“小小的心意”<sup>26</sup>里，主人翁可欣和一班同学为



胜利书局“蜗牛少年儿童读物”之一的《漫游新加坡》。

了该如何给老师们庆祝教师节而相持不下，有的提出买礼物给老师，有的建议请老师吃东西，有的又担心花费太大会被家长骂，吵个不休。最后班长邦邦提醒大家，级任林老师曾经说过“只有亲自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珍贵、最有意思的”，因此提议大家从家里带一些食物来请老师和同学们吃，并亲手制作礼物送给老师。大伙儿接受了邦邦的意见，并且互相帮忙收集和提供材料（火柴盒、巴士车票、颜色纸等），让彼此能够发挥创意和手艺，做出最漂亮的礼物。在可欣寄宿的宿舍里，其他寄宿生们也动脑筋帮助可欣解决制作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这一章并不长，但是内容却洋溢着温馨，作者细腻的文笔让读者能够透过文字感受到可欣与同学们对老师的敬爱和感恩，以及想做出“全世界最好的礼物”送给老师的心意。

在《我的世界快乐多》中，丽莲的母亲以售卖椰浆饭补贴家用，而为了让母亲多休息，就读小学六年级的丽莲，课余总是抢着拎起饭篮，到组屋区叫卖。同学雪华知道后，经常向她购买椰浆饭，每次买的都不仅是一、两包，而是八包十包。一天，丽莲又带着十包椰浆饭到雪华家温习功课，雪华有事走不开，丽莲便将饭拿到厨房，想放进冰箱里。结果，她发现冰箱里满满地塞着一包包的椰浆饭，都是雪华向她购买的。当雪华到厨房找丽莲时，看见她愣愣地站在冰箱前，呆视着眼前堆积如山的饭包。

室内空气紧张，一片静寂。……

“你们都不喜欢吃椰浆饭，你为什么还要常常买呢？”

“我——我——”雪华嗫嚅着，半晌，艰难的解释：“你每天放了学，还得赶着买东西赚钱，这样一定是很苦很忙的，尤其是最近学校测验多，会考又快到了，你怎能应付呢？我又帮不了你的忙。我想如果我向你多买一些，你便会快点卖完，不必花太多时间在路上叫卖，可以回家多温习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激你，你这样帮我，必定用了你妈妈不少钱了。”

“你放心！我用的全是我储蓄的钱。”

雪华忙不迭的加了一句。

丽莲想起雪华休息时经常不到食堂去买点心吃，原来是为了省下钱来买她的椰浆饭，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sup>27</sup>

丽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然而雪华的懂事、两人之间的真挚友谊也让读者很难不被深深感动。

## 康乐活动

在互联网和平板电脑出现之前，儿童的康乐活动很多时候是需要运用四肢的。八十年代的儿童玩具中虽然已出现了电子游戏机，但是由于价格昂贵，并非每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因此故事里的主人翁玩的通常是传统的玩具或游戏。

在《秀秀和启华的日记》里，主人翁秀秀和邻居法蒂玛一起到联络所去看人比赛藤球。除了藤球场，联络所里还有篮球场、羽球场……

喜欢运动的人可以参加各种球类或拳术班，喜欢静的人可以参加象棋会、文学会、口琴班和美术班；想要学一门手艺的人可以参加缝纫班、家政班和插花艺术等班级。<sup>28</sup>

年纪小小的秀秀便对缝纫班很感兴趣，想学会裁剪，给自己缝制衣服，但是妈妈要她先读完小学，会考及格后，大一点才去联络所学习裁剪。

《小顽皮学乖了》的第二章里对孩子们之间的游戏有着生动的描绘<sup>29</sup>——主人翁可欣和其他的寄宿生课余在园子里喧闹地玩着跳绳游戏“zero point”、追逐游戏“瞎眼猫”，不爱跑动的则坐在树荫下用粘土捏成各种小动物，一动一静、错落有致的描写呈现出一幅欢快的热闹画面，让读者透过文字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和天真无邪。

## 结语

综上所述，198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所展现的“新加坡儿童”大致可勾勒出这么一个轮廓：

- a. 他们多数出身中下阶层，少数来自富裕家庭；
- b. 他们多数住在组屋里；
- c. 孩子们的父母大多对他们的学习成绩要求甚高，有些甚至极为苛刻，只有少数父母持无所谓态度；
- d. 孩子们的品格都相当淳朴，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大多纯真诚挚，较少出现以功利为出发点，或分数、金钱至上的心态；
- e. 孩子们大多喜爱参与运动、传统游戏和康乐活动，只有少数热衷于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机。

若与现今新加坡社会的儿童相比，以上除了第三点外，其他恐怕大不相同。新加坡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2013年的国民人均收入为66, 298新元，<sup>30</sup>已可与经济强国美国看齐，因此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应比三十多年前少得多；不少家庭也逐步提升住宅环境，迁入私人房产。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有部分父母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高，那如今这样的父母只是有增无减，以致于少年儿童因学习压力而患上精神和情绪疾病的情况有显著的增加。<sup>31</sup>社会风气对高收入、高消费生活方式的追捧，除了影响父母，也会影响孩子，因而如今本地儿童年纪小小就出现虚荣、功利心态已不足为奇。而自从平板电脑问世后，经常可在公共场所看到专注在电脑上玩游戏或看影片的儿童“低头族”，其中不少还是父母主动为孩子携带电脑，以避免孩子因跑动玩乐而发出喧闹声。

另一方面，纵观这些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儿童小说，也同样可以归纳出一些特点：

- a. 有些小说虽然添加了科幻元素，<sup>32</sup>或以拟人化方式从物体的角度描绘故事情节，<sup>33</sup>但是在谈到现实情况时，绝大部分作品还是以写实手法去揭露孩子们所遭遇的问题，例如前文所述秀花、丽莲的家境问题；或揭露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象，如因家长外出工作而出现的锁匙儿

童、<sup>34</sup>因家庭破裂而出现的问题少女等。<sup>35</sup>

- b. 作为儿童读物，这些小说传递的通常都是正面的讯息和价值观，如不能偷窃、<sup>36</sup>路不拾遗、<sup>37</sup>帮助弱小、<sup>38</sup>协助长辈、<sup>39</sup>爱护动物、<sup>40</sup>爱惜东西、<sup>41</sup>“满招损，谦受益”等。<sup>42</sup>
- c. 作为新加坡作品，一些小说内容不忘增添本地色彩，如介绍组屋生活、军营生活、<sup>43</sup>各种美食，<sup>44</sup>或宣扬种族和谐等。<sup>45</sup>

儿童文学在八十年代初受到本地各界人士众声喧哗的讨论。其中，文化部还在1980年主办了“儿童故事”创作比赛，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在收到的172篇参赛作品中，107篇以英文写作，65篇以华文写作。<sup>46</sup>

虽然政府、文坛和出版界都有所动作，希望能够改善华文儿童文学作品量少的情况，然而，数年后南马文艺研究会会长张发依然慨叹东南亚华文儿童文学的创作不受重视，以致发展缓慢，作品短缺。他认为，东南亚的华文作家都较忽略儿童文学的创作，有些甚至认为儿童文学属“小儿科”，不屑一顾。他指出，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从事华文儿童文学创作的人也不多，约各有十人而已；而每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不超过五十种，其中本地创作，富有本地色彩的还占不到百分之三十，这是因为在新加坡，以中外名著或儿童读物改编的作品往往比富时代和民族色彩的原创作品更受欢迎。<sup>47</sup>

作家洪生（白里红）回忆1980年他到小学图书馆去参观时，发现十本华文儿童读物中竟有八本是民间故事。十年后，虽然许多出版社每年都大量出版儿童读物，但是根据粗略统计，一年里上市的约百来种儿童读物，其中绝大部分是翻译、改写或重述外国的民间故事；出版商要找人创作儿童文学时，竟无人问津。<sup>48</sup>时任勿洛集选区议员的黄海博士也指出，1988年本地有2074本书籍出版，其中只有179本是儿童故事书。他强调，儿童故事写作者应以新加坡人事为题材；写作者必须忠实地写出他们的生活，反映出都市的特色，城

市的景观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姿采，因为这正是我国儿童需要阅读的故事。<sup>49</sup>

有言论认为，本地写作人不热衷于儿童文学创作，最大原因相信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鼓励；儿童文学创作者在本地是默默耕耘的一群，他们只能自费出版，自负盈亏。<sup>50</sup>

姑且不论儿童文学创作者是否真的不受重视或没有受到鼓励，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儿童文学在新加坡文艺发展史中挣扎求存的过程时，便碰到了一个甚具反讽意味的后遗症：如果说，在照相机尚未发明的年代，文字的描绘如同为当年的人留下影像的话，那么没有足够的文字记载便等于没有留下充分的影像，让后人得以从中了解当年的人的面貌。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无法单从八十年代出版的儿童文学中去充分地了解当时新加坡儿童的生活面貌，是因为当年没有创作出足够的作品去记录儿童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必须依靠报章报道、照片等其他材料的辅助。可悲的是，这个现象一直存在，从建国初期直至今天，以本地生活为背景的儿童文学一直得不到充裕的滋养，发展不起来。

笔者虽然尽量从能够找到的文学作品中去归纳出八十年代新加坡儿童的特征，但是由于符合探讨范围的资料有限，因此他们的面貌还是模糊的、不完整的，甚至片面的。然而，正因如此，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才更显得难能可贵，幸好当年尚有这一批文艺作者和出版社<sup>51</sup>愿意逆流而上，不计盈亏地为儿童们创作出适合他们的本地读物。由于他们的努力，八十年代新加坡儿童在文学作品中留下的面貌身影即便模糊残缺，却不致于一片空白。◆

\_\_\_\_\_

**注释**

<sup>[1]</sup> “王鼎昌吁书籍出版商应该多为我国儿童出版民间故事书：唯需具有本地色彩及文化传统”，刊1979年9月1日《星洲日报》，页4。

<sup>[2]</sup> “文化部主办儿童故事创作比赛：当局吁请本地作家积极参加比赛”，刊1980年5月8日《星洲日报》，页11。

<sup>[3]</sup> 例如郑雯“重视儿童文艺创作”，刊1980年3月26日《星洲日报》页26；夏澄“推广儿童文学的具体方法”，刊1980年3月31日《南洋商报》页10；火雷红“我对新一年文坛的展望”，刊1981年1月6日《南洋商报》页30；李建“我国儿童文学写作的

<sup>[4]</sup> 新方向”，刊1981年4月3日《星洲日报》页25；陈彦“八一年儿童文学回顾”，刊1982年1月7日《星洲日报》页30；洪荣狄“出版儿童书籍”，刊1983年2月4日《星洲日报》页32；笋心“鼓励儿童文学”，刊1983年6月9日《联合早报》页15；李汝琳“儿童文学应当受到重视”，刊1983年6月10日《联合早报》页42等。

<sup>[5]</sup> “80年代的新加坡文艺”，刊1980年1月1日《星洲日报》，页24。

<sup>[6]</sup> “谈我国儿童文学”，刊1979年7月27日《星洲日报》，页22。

<sup>[7]</sup> 《小顽皮哭了》，页72；《小顽皮学乖了》，页125。

<sup>[8]</sup> 谭秉“新加坡·香港·南韩·台湾：美国人眼中的‘亚洲四小龙’”，刊1981年8月29日《星洲日报》，页49。

<sup>[9]</sup> Aleshire, I. [1985, November 13]. More living space in today’s homes: average number of persons per room drops. *The Straits Times*, p.16.

<sup>[10]</sup> 《我的世界快乐多》，页2–3。

<sup>[11]</sup> 《小顽皮学乖了》，页65–76。

<sup>[12]</sup> 同上，页100–01。

<sup>[13]</sup> 青青草《跳字手表》，见《跳字手表》，页8。

<sup>[14]</sup> Toh calls for higher levels. [1965, August 29]. *The Straits Times*, p.15.

<sup>[15]</sup> Intensive Govt effort to train skills for many industries. [1965, December 5]. *The Straits Times*, p.13.

<sup>[16]</sup> Need for overseas training for growth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1971, January 14]. *The Straits Times*, p.4.

<sup>[17]</sup> Engineer head-hunting here and abroad for MRT. [1983, November 27]. *The Straits Times*, p.11.

<sup>[18]</sup> Best way to keep up with today’s needs – by SIM chief. [1967, February 8]. *The Straits Times*, p.12.

<sup>[19]</sup> 孟紫《可怜的小龙》，见《跳字手表》，页31–40。

<sup>[20]</sup> 《我是小顽皮》，页88–93；《小顽皮学乖了》，页93–98。

<sup>[21]</sup> 《漫游新加坡》，页29–30、47–49。

<sup>[22]</sup> 陈森汉《妈妈，你还爱我吗？》，见《儿童故事：入选作品》，页11–20。

<sup>[23]</sup> 石君《我要100分》，见《小树·小树》，页75–82。

<sup>[24]</sup> 何晓《玲玲的星期天》，见《玲玲的星期天》，页76–85。

<sup>[25]</sup> 君盈绿《不能公开的礼物》，见《跳字手表》，页62–76。

<sup>[26]</sup> 同上，页64–65。

<sup>[27]</sup> 《小顽皮哭了》，页44–56。

<sup>[28]</sup> 《我的世界快乐多》，页35–36。

<sup>[29]</sup> 《秀秀和启华的日记》，页18。

<sup>[30]</sup> 《小顽皮学乖了》，页11–14。

<sup>[31]</sup> Latest data from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latest\_data.html (last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4).

<sup>[32]</sup> “因过度追求完美，更多青少年患强迫症”、“家长‘望子成龙’是孩子患病祸首”，刊2001年3月3日《联合早报》，页6。

<sup>[33]</sup> 青青草《小凡的太空朋友》、君盈绿《不能公开的礼物》，见《跳字手表》，页41–50、62–76。

<sup>[34]</sup> 孟紫《一张课桌的奇遇》和《可怜的小龙》，见《跳字手表》，页11–20和31–40。

<sup>[35]</sup> 《妈妈，我回来了》里的诗慧。

<sup>[36]</sup> 《压伤的芦苇》里的美娟。

<sup>[37]</sup> 陈彦《老师、我错了》，见《跳字手表》，页26–30。

<sup>[38]</sup> 郑慧华《一盒彩笔》，见《儿童故事：入选作品》，页36–41。

<sup>[39]</sup> 陈森汉《快乐回来了》，见《儿童故事：入选作品》，页66。

<sup>[40]</sup> 石君《那双手》，见《小树·小树》，页56–60。

<sup>[41]</sup> 陈绿薇《独眼兔》，见《儿童故事：入选作品》，页42–48；石君《麻雀》，见《小树·小树》，页19–24。

<sup>[42]</sup> 杨秋卿《小玉的洋娃娃》，见《儿童小说》，页6–10。

<sup>[43]</sup> 杨秋卿《演奏会上》，见《儿童小说》，页15–17。

<sup>[44]</sup> 《秀秀和启华的日记》，页16–17。

<sup>[45]</sup> 石君《午餐》，见《小树·小树》，页1–4。

<sup>[46]</sup> 石君《朋友们》，见《小树·小树》，页6–10；《秀秀和启华的日记》，页8–9。

<sup>[47]</sup> 丹那巴南（外交兼文化部长）“序言”，见《儿童故事：入选作品》，页iii。

<sup>[48]</sup> “东南亚华文作家忽略儿童文学创作”，刊1988年8月16日《联合早报》，页4。

<sup>[49]</sup> 洪生“新华儿童文学景观（上）”，刊1990年7月1日《联合早报》，页45。

<sup>[50]</sup> “儿童宜培养阅读习惯，不应沉迷电子游戏中”，刊1990年9月7日《联合早报》，页5。

<sup>[51]</sup> 向民“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刊1987年5月30日《联合早报》，页20。

<sup>[52]</sup> 例如教育出版社、联邦出版社、世界书局有限公司、泛亚有限公司、胜利书局、胜友书局等，见“积极推广儿童文学创作”，刊1980年3月29日《星洲日报》页23。

#### 参考书目

陈彦编《秀秀和启华的日记，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

董秀蓉、胜利书局图书编辑小组合著《妈妈，我回来了》，新加坡：胜利书局，1981。

何若锦《我的世界快乐多》，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1981。

何若锦《压伤的芦苇》，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1986。

何晓《玲玲的星期天》选集，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3。

胜利书局图书编辑小组《我是小顽皮》，新加坡：胜利书局，1981。

胜利书局图书编辑小组《小顽皮哭了》，新加坡：胜利书局，1982。

胜利书局图书编辑小组《小顽皮学乖了》，新加坡：胜利书局，1982。

石君《小树·小树》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83。

新加坡文化部主办《儿童故事：入选作品》选集，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82。

新加坡作文人协会、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合编《跳字手表》选集，新加坡：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83。

杨秋卿《儿童小说》选集，新加坡：人民书局，1981。

郑文辉、胜利书局图书编辑小组合著《漫游新加坡》，新加坡：胜利书局，1983。

#### 中文报章

“80年代的新加坡文艺”，刊1980年1月1日《星洲日报》，页24。

陈彦“八一年儿童文学回顾”，刊1982年1月7日《星洲日报》，页30。

“东南亚华文作家忽略儿童文学创作”，刊1988年8月16日《联合早报》，页4。

“儿童宜培养阅读习惯，不应沉迷电子游戏中”，刊1990年9月7日《联合早报》，页5。

洪荣狄“出版儿童书籍”，刊1983年2月4日《星洲日报》，页32。

洪生“新华儿童文学景观（上）”，刊1990年7月1日《联合早报》，页45。

火雷红“我对新一年文坛的展望”，刊1981年1月6日《南洋商报》，页30。

“积极推广儿童文学创作”，刊1980年3月29日《星洲日报》，页23。

李建“我国儿童文学写作的新方向”，刊1981年4月3日《星洲日报》，页25。

李汝琳“儿童文学应当受到重视”，刊1983年6月10日《联合早报》，页42。

谭秉“新加坡·香港·南韩·台湾：美国人眼中的‘亚洲四小龙’”，刊1981年8月29日《星洲日报》，页49。

“谈我国儿童文学”，刊1979年7月27日《星洲日报》，页22。

“王鼎昌吁书籍出版商应该多为我国儿童出版民间故事书：唯需具有本地色彩及文化传统”，刊1979年9月1日《星洲日报》，页4。

“文化部主办儿童故事创作比赛：当局吁请本地作家积极参加比赛”，刊1980年5月8日《星洲日报》，页11。

夏澄“推广儿童文学的具体方法”，刊1980年3月31日《南洋商报》，页10。

向民“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刊1987年5月30日《联合早报》，页20。

“因过度追求完美，更多青少年患强迫症”、“家长‘望子成龙’是孩子患病祸首”，刊2001年3月3日《联合早报》，页6。

郑雯“重视儿童文艺创作”，刊1980年3月26日《星洲日报》，页26。

笋心“鼓励儿童文学”，刊1983年6月9日《联合早报》，页15。

#### Newspaper articles

Aleshire, I. [1985, November 13]. More living space in today’s homes: average number of persons per room drops. *The Straits Times*, p.16.

Best way to keep up with today’s needs – by SIM chief. [1967, February 8]. *The Straits Times*, p.12.

Engineer head-hunting here and abroad for MRT. [1983, November 27]. *The Straits Times*, p.11.

Intensive Govt effort to train skills for many industries. [1965, December 5]. *The Straits Times*, p.13.

Need for overseas training for growth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1971, January 14]. *The Straits Times*, p.4.

Toh calls for higher levels. [1965, August 29]. *The Straits Times*, p.15.

#### Web resources

Latest data fo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rom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Retrieved on 24 February 2014 from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latest\_data.html.